

白龙江流域藏族文化的边缘性 及其成因研究 ——以甘肃宕昌县藏族为例

魏梓秋

(西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地处白龙江流域的宕昌县藏族在服饰、民居、语言和信仰等方面均与其它地区藏族有明显区别,他们保留了一些古羌文化习俗,同时也深受汉文化影响,具有典型的“边缘性”特征,该地区长时间复杂的民族交往历史和封闭、险恶的自然环境是宕昌县藏族文化“边缘性”形成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宕昌县藏族;文化;边缘性;成因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42(2007)03-0040-04

白龙江是嘉陵江的一级支流,发源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郎木寺乡境内,由西向东贯穿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迭部、舟曲县、甘肃省陇南市的武都县、文县和宕昌县,注入嘉陵江,全长 454 千米,因此,人们习惯把居住在这一区域的藏族称为白龙江流域藏族。宕昌县北接岷县,西与西南靠甘南藏族自治州,南邻武都市,东接天水地区,总面积 3331 平方公里,山地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 71%,山脊海拔多在 4000 米左右,白龙江的支流岷江水系是县域内的主要河流,白龙江干流从该县南端穿过。

历史上,曾有“宕昌羌”在今宕昌一带建立政权,频繁活动,宕昌羌被北周灭后,“自后无闻”,20 世纪中后期,“宕昌”再次被关注,因为有学者发现“岷县东南之宕昌县,那里的藏民与其他地区藏民不同,他们的服装,特别是妇女,与藏族妇女完全不同。语言虽讲藏语,但与其他地区的藏语不一样”,并认为这些藏民“是古代宕昌人之后”,^[1]任乃强先生认为“党、丹、宕、铁,也是一音之转。疑皆宕昌遗裔的部族”,又说“甘肃的宕昌、舟曲、迭布三县,主要是迭部土司旧民,迭、铁、叠、与宕、党、达、夺,是一音之转”,“可能属于宕昌遗民”,^[2]现代地方志和许多研究者也都认为他们可能是古羌人的后裔。那么,宕昌县藏族到底有哪些特殊性呢,通过田野调查及比

较分析后,笔者认为宕昌县藏族文化体现了具有较强代表性的“边缘性”特征。

一、宕昌县藏族文化的边缘性

结合文献资料、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田野调查资料,通过对比研究之后,笔者主要从服饰、民居和宗教信仰三个方面说明宕昌县藏族文化的“边缘性”特征。

(一)宕昌县藏族服饰与传统藏族服饰有明显差别

1994 年,有学者在宕昌县考察时看到当地藏族男子一般头缠五尺至一丈的青布帕子,身着黑、蓝色左衽大襟上衣,袖口处镶四指宽白布,腰系自织褐色系腰,腿打缠子(绑腿)。^{[3]p80}作者于 2005 年考察时看到当地藏族男子和孩子在日常生活都穿着汉族服装。宕昌县藏族服饰特色主要体现在其中老年妇女服饰上。该地区的藏族妇女一律梳一独辫,辫子长、粗、黑,掺有假发,扎黑、红、绿色头绳,未婚少女为红色,订婚的青年女子为红、绿两色,已婚女子为绿色,老年妇女为黑色。头上均要包帕,包帕分两层,底下紧挨头发的为白布,表面一层是黑布,包勒之后,帕角在头顶靠后一点显起两个羊角状的布角,高 4 至 5 公分,杨海帆先生认为这“合于古‘羌’字的造型。甲骨文中‘羌’字形是一个侧立或正面立头戴羊角

【收稿日期】2007—05—28

【基金项目】西北师范大学青年基金项目(NWNU-QN-06-7)

【作者简介】魏梓秋(1980—),女,江苏沛县人,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部少数民族文化史。

饰品的人。所以,大河坝是一部活生生的行走着的古“羌”字典。^[4]宕昌县女子上衣是领子、袖口镶花边的大襟衫,颜色较鲜艳,外罩坎夹,以黑色或藏蓝色为主,下身着深色长裤,与汉族服饰类似,足蹬红色高筒黑鞋面的绣花文纹鞋,鞋不分左右脚。喜欢佩戴铜、银质长穗大耳环、镯子、铜牌等首饰,多为老人所传。

(二)宕昌县藏族民居不同于一般藏族民居

八十年代,有学者看到在“古宕昌国的腹地,即今武都县两水以北、舟曲县城以东,宕昌县官亭以南,岷江和白龙江沿岸南北约百里左右的峡谷地带,现今居民居住着一种笼子式的、没有院子即“四围无障蔽”的高大楼房”,“宕昌县岷江与舟曲县白龙江分界的大石山(良恭山)北麓林区宕昌藏民居住地,有另一种称“木垒”的住屋,圆木作棚,互相重迭而成大木笼,顶部有坡度,覆以搭板或树枝茅草,长三至八米,宽二至三米,高二至三米,门窗处锯断圆木使之成洞,做门窗安置其间,内用木板隔为二、三、四间不等”,^[5]并认为这两种独特的房屋建筑就是演进后的古羌房。

今宕昌县藏族民居被称为“榻板房”,或“榻板”、“板屋”。榻板房为土木结构建筑,墙体以土夯筑,房顶用长约2米,宽约15公分,厚约2公分的木板分阶梯垂直于屋脊铺设,再平行于屋脊钉上厚木条以防止石块滑落,榻板就地取材,以山中松木为原材料,榻板上压一排排白色大鹅卵石,防止木板被风吹起,鹅卵石间距排列整齐,以鹅卵石压榻板,占地面积小,木板不容易腐烂。榻板房分上下两层,有些人家将一楼作为储藏室,二楼住人,有的人家相反。人们的日常生活,如吃饭、喝酒、休息、睡觉、待客、集会和敬神等都在榻板房里。

(三)宕昌县藏族宗教信仰表现出明显的多元化

宕昌县藏族主要信仰藏传佛教,村子里有藏传佛教寺院,大殿内供达赖喇嘛像,很多村民的家里也都供达赖喇嘛像,他们每年要从甘南请喇嘛来念经,农历七月十一要举行大型迎神会,迎神会上由村里的男子穿上藏族服装,头戴面具,手执羊皮鼓,当地人称为“凶猛舞”。宕昌藏族村寨里有神头,当地人认为“神头是伺候神的”,神头是村里的长者,也是村里最有威望的老人,村里的大小公共事务都由神头负责处理,重大的祭祀和宗教活动由神头主持,村里人普遍认为神头会治病,很多人得了病都要去找他治,神头的产生一般是父子继承,家族传承。宕昌县藏族家家都供养家神,家神也叫护神,可以庇护家庭的安全及财富等等。每家都有神像,平时用红布包裹,立放在正屋墙上,用白色的剪纸遮盖,还有很多瓶瓶罐罐,里面插着各种白色剪纸和白色纸剪的小人,每一张剪纸代表一位神,每家都供有将近二三十个这样的剪纸。他们信仰的地方神主要有两位,一位是“尚沙龙王”,一位是“凤凰山神”,前者为水神,后者为山神。有趣的是新坪村村头的庙宇供奉的是一位女神,当地人称“娘娘”,这位女神的打扮完全是一位汉族贵妇人的形象,带有很强的道教色彩。据神头介绍,这位女神也是管家事的,每年农历七月十一的迎

神会也要将这位女神抬出来祭祀,十二日晚上送回。有村民家中供奉的牌位上写着:“护福龙神、五方五帝五德二十五宅太君、以及本音门三代祖宗老纳家亲”,体现了中国古老的神灵崇拜和祖宗崇拜合一的现象。总的来说,宕昌县藏族宗教信仰表现出明显的文化混杂现象,他们主要信仰藏传佛教,但又交织混杂着民间信仰、汉族道教信仰等,各种信仰难以做十分清晰的区分。

宕昌县藏族在很多方面的确有其特殊性,但是他们究竟是不是古羌人的后裔,或者就是“宕昌羌”的后裔?他们和羌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为什么会呈现出如此特殊的文化面貌?这一特殊的民族群体究竟向我们展示了怎样的历史线索?笔者尝试通过各种正史、方志及碑文等资料就以上问题做一探索和分析。

二、宕昌县藏族文化边缘性形成的历史原因

有充分的文献资料表明古羌人在今甘肃的洮、岷地区生活的历史十分久远,清修《岷州志》卷三有按:“岷州孤悬绝塞,与氏羌杂处,南接西固、阶、文,为古阴平入蜀之要道……”,《舆地广记》记洮、岷等地“接近胡戎,多尚武节,自东汉魏晋,羌氏屡扰”。羌人在这一地区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一)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秦代所指的“羌中”即包括后世的洮、岷二州地,《括地志》云“陇右岷、洮、丛等州,西羌也”,“羌中,从临洮西南芳州(今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扶(今文县西北)、松(今四川松潘县)府以西,并古诸羌地也”,当时洮、岷二州是古羌的东界,河西走廊以南,洮、岷二州之西也分布有羌族。汉景帝时(前156年——前141年)原居住于湟水流域的种羌就迁移至狄道(临洮)、安故(临洮县南)至临洮(岷县)、氏道(礼县西北)、羌道(宕昌西南)一带。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东晋隆安四年(400年),羌族首领梁勤建立宕昌国,统治地域包括今甘肃的临潭、岷县南部至天水西界和武都北界一带地区,中心地域在今甘肃舟曲县、宕昌县、迭部县一带,《南史》记:“河南、宕昌、邓至、武兴,其本并为氏、羌之地。”北周武帝天和元年(566年),大将田弘平羌,灭宕昌国,遂设宕州。宕昌、邓至国灭后,党项羌兴起,其大部分融于党项。

(二)隋唐时期

公元七世纪中叶,吐蕃兴起,唐宝应二年(763年),宕昌陷于吐蕃。《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唐会要》等史籍中或者说吐蕃“本汉西羌之地也”,并臣服“群羌”,或认为“吐蕃本西羌属”,《资治通鉴》注:“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阶州直隶州续志》记载吐蕃“男子以赭涂面为好,妇人辫发而索之,其俗重鬼女巫,事獬豸为大神,喜浮屠法,习诅咒,兵勇而法严,贵壮贱老。……其俗大约似氏羌而微有不同”,可见,西羌和吐蕃曾在活动地

域上重合,在文化上接近。唐初,吐蕃逐渐臣服了其周边许多民族,控制了大片地域,代宗广德元年(763年)秋七月,“吐蕃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占领了今岷江流域、白龙江流域和白水流域,唐建中四年(783年)清水会盟后,白龙江流域陷入了吐蕃的实际统治之下。为统治河陇属部,吐蕃在与唐朝交界地区安置了许多军事人员长期驻守,大量卫藏地区(即本部)各部壮丁、被征服的各民族及吐蕃贵族家眷和奴仆也随军迁居河陇地区,实际上是一次民族的大迁徙活动,河陇地区一度出现吐蕃化趋势。吐蕃王朝崩溃后,驻守在甘、青地区的藏军及其家眷和奴仆们并没有退回卫藏,史书中将其称为“浑末”或“唃末”,《新唐书》曰:“浑末,亦曰唃末,吐蕃奴部也。虏法,出师必发豪室,皆以奴从,平居散处耕牧。及恐热乱,无所归,共相啸合数千人,以唃末自号,居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间,其近蕃牙者最勇,而马尤良云”,《阶州直隶州续志》又记:“番奴部也,……其在阶、文等州者,皆与氏、羌杂处,自分部族,中朝人总以西番名之,不复别为发种、唐种也。五代时衰弱不能为患,至宋熙宁七年,武都夷内附,凡内附者为熟户,今谓土户者,是与齐民无异”,由此可见,舟曲、文县、宕昌一带,吐蕃“无所归”的军奴与氏、羌及汉族杂居,逐渐发生民族融合,又因为此地吐蕃人数多,影响大,所以汉籍中泛称“西蕃(西番)”,但“西蕃”并非单一的藏族,其中包括藏化之氏羌和未完全藏化之氏羌。

马长寿先生分析羌人融于汉族时,谈到了唐中后期甘肃羌人的情况,他说:“此时秦陇地区的羌族进一步融合于汉,河湟及四川西北一部分羌族逐渐融合于藏。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中叶,因吐蕃北上,原在四川西北的党项羌及其统治下的部分羌族被唐朝迁徙到河套一带,至宋时建立了西夏政权。于是唐代以后,今河套以南,宁夏、甘肃东北又有了许多羌族部落。其次,唐末吐蕃衰弱,张议潮收复河陇之地,但不久这里又为回鹘、吐蕃及其奴部唃末、驪族和羌族所据。”^[9]

(三)宋代以后

两宋时期,宕昌地区的羌人活动仍然比较频繁,宕昌一带北面有党项建立的西夏,西南紧邻吐蕃,正好处于宋、吐蕃和西夏的交界地带,虽然此时羌人没有建立独立的政权,但羌人勇猛善战,还有相当数量,常是各方争取的力量。蒙元时期,宕昌地区羌人近汉人之地大多已融入汉族,而近蕃人游牧之地又多融入蕃族,也有因受蒙古人统治而融入蒙古族者,^[7]阶、岷、迭、宕等地开始实行土司制统治蕃族。明清时期,宕昌境内有马、赵二土司管辖藏族人民,“马氏世居宕昌城”,至20世纪30年代,两土司统辖时间约560年。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羌人大多已融入汉、藏,但洮、岷地区的羌人最后融合于汉、藏的时间则较晚,《明史》仍有记载天顺七年(1463年),项忠平定洮岷羌叛,成化十二年(1476年),“岷州栗林羌为寇,余子俊潜师设伏击走之”,明朝万历年间张益谦撰《岷

岷边备道题名记》云:“道之置自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羌之叛始弘治18年(公元1505年),罢之。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羌叛,复置”。

王洲塔先生认为,活动在今甘肃地区的一部分羌人“开始东迁并逐渐融合于华夏族的同时,留居在今甘肃境内的羌人各部落继续保持着自己的民族传统和特色,并与青藏高原腹地的藏族先民的其它部落仍保持着联系”。^[8]宕昌地区一直处于各民族区域的边缘和交界地带,“羌人即成为汉藏两族之间的族群缓冲地带,也就是所谓族群的边缘,随两族势力的消长而改变其范围”,^[9]结果是,接近汉区的羌人逐渐汉化,接近藏区的羌人逐渐藏化,虽然一部分羌人自唐以后逐渐藏化,但是仍有“未完全藏化之氏羌”,即现代这一带民族学调查所发现的部分与藏族差异较大的一些地方藏族群体,有学者认为这就是后期汉籍中零星记载的少量氏羌人,但有些氏羌与古氏羌比较已发生了变化,原因“他们是受吐蕃影响极深的羌人”,^[10]这也是今宕昌县藏族特殊文化面貌形成的主要历史原因,这支藏族群体具体而生动地体现了这一地区民族历史发展演变的脉络。

三、结语

综上所述,认为宕昌县藏族就是古羌人或者“宕昌羌”的遗民,未免忽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民族逐渐融合、消亡和演变的过程及结果,但宕昌县藏族确实与曾频繁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古羌人有很深渊源,不同民族文化在冲突、碰撞和交流的过程中,文化的融合与交互必然相伴而生,而且大多是弱势被强势所同化,然而,少数民族独特的环境适应性造就的具有鲜明特色和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也很难被外来文化完全覆盖和替代,外来文化常常以各种方式被整合,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另外,面对异文化的冲击和压迫,人们一方面不得不去适应,另一方面与外来文化或主体文化在心理上的距离感始终存在,又本能地加以防范和排斥,所以,在民族交接杂居的边缘地带,民族间文化的影响形成一种交错的状态,有学者将其形象地比喻为“虎背斑纹”式的文化遗迹现象。^[11]在羌向藏的演变过程中,有些地方的羌人彻底被藏同化而变成典型的藏族,有些地方则“同而不化”,留下古老氏、羌民族文化的斑点,同样,在文化的边缘地带,远离母体的各种边缘文化关系的发展演变就会出现特殊的“弱弱相和”现象,即实力较弱的若干个文化相互交融,和谐共存,最终形成一种新的、特殊的复合型文化。^[12]宕昌县藏族就属于这类情况的典型,他们的文化面貌既体现了古羌人藏化的历史过程,又反映了古羌人处于汉、藏族边缘的特殊地位,因而兼具羌、汉、藏多种文化因素。

另外,除了有上述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对其民族文化传统的保留和发展方向起到了重要作用,使我们今天看来这一地区的文化呈现出特殊的边缘性特征。在被其他民族征服的过程中,一部分古羌人逃

离或被迁徙至偏远的深山密林中,借助封闭、险峻的地理环境得以生息繁衍,并能一直保持一些古老的文化传统。宕昌县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岷山山系与西秦岭延伸部分的交错地带,境内高山峡谷密布,河流纵横湍急,自然环境险恶,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各种外来文化难以渗透、并且完全覆盖其原有文化。这里虽然地处安多藏区,但其间却有大山阻隔,使它像一个文化上的孤岛,与汉、羌、藏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千百年以来,宕昌县藏族能一直保持许多古老的民族传统,甚至保留了古羌族的文化元素,都有赖于此,直到今天,这里仍然十分闭塞,村里很多中老年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他们的家乡。

【注 释】

[清]郭京范,田而穉.《岷州志》卷三,《舆地下》[A]//西北史地文献,第39卷.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

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一[A]//丛书集成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

孙星衍辑.《括地志》卷八[A]//丛书集成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

《南史》卷七九,《夷貊(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纪》太宗贞观八年十一月甲申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

[清]叶恩沛、吕震南.《阶州直隶州续志》卷三三,《番夷》

[A]//西北史地文献,第46卷.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唐纪》代宗广德元年七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

《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

《靖史稿》卷五一七,《吐司六·甘肃》,北京:中华书局,1977.

《朝史》卷一七八,《颀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朝史》卷一七八,《余子俊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民国]张维.陇右金石录[A]//西北史地文献,第182卷.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

【参考文献】

- [1] 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 [2] 任乃强.达布人的族源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 [3] 杨士宏.宕昌羌故地遗俗述证[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3):90.
- [4] 杨海帆.炎帝·宕昌羌[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3):36.
- [5] 陈启生.宕昌考辨[J].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84,(3):82.
- [6] 马长寿.氏与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 [7] 林惠详.中国民族史(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 [8] 王洲塔.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
- [9]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 [10] 闵文义.东迁蕃民与舟曲藏族——舟曲藏族渊源初探[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4,(2):80-88.
- [11] 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 [12] 贺卫光.论边缘文化与复合型文化——以裕固族及其文化的形成为例[J].西北民族研究,1999,(2):209.

Researches on the Marginality and Genesis of the Tibetan Culture along the Bailongjiang River Basin —Exemplified by the Tibetan Nationality in Dangchang County of Gansu

WEI Zi- qiu

(School of Tourism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Tibetan nationality inhabiting the Bailongjiang River Basin is remarkably different from its counterparts elsewhere in costumes, folk houses, languages and religious beliefs. This branch has retained some folk customs of the ancient Qiang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Han culture and therefore is characterized by marginality. Time-honored complicated national contacts, closed and inclement natural surroundings have contributed much to the formation of marginality of the Tibetan culture in Dangchang County.

Key words: Tibetan nationality in Dangchang; culture; marginality; genesis